

学术专论

“八旗值月档”与清初《实录》的关系

[日] 加藤直人著 张永江 曹毛响 译

〔摘要〕本稿着力探讨了清初起居注官设立以前形成的“八旗值月档”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与早期《实录》体史书的关系。认为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二旗按月轮番记录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已被延续下来。“值月档”记载内容，从“天聪五年档”来看，包括有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这些“日录”作为档案由书房（文馆）保管，以此为基础由“巴克什”编辑成专题档册；并和对外文书一起，作为《实录》等史书编纂时的基础资料来使用。“值月档”久已不存，但崇德元年的《太祖太后实录》，还有顺治年间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与其有着密切关联。

〔关键词〕八旗值月档 文馆 清初实录 编纂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1)-01-0117-07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nthly Archives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ssence and formation of the *Monthly Archives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onthly Archives* and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early emperors/Khans in the Qing dynasty.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compilations of *Monthly Archives* by two Banners of the same major colors were officially formed at least in the beginning of Hong Taiji's reign. As a sample archive of 1631 reveals, *Monthly Archives* recorded various events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by focusing on the speeches and actions of Grand Khans on daily basis. These archives were officially preserved in the Literate Institute, and were compiled together in different subjects by Manchu literati officials. Together with inter-state documents, these archives became original sources of the later *Veritable Records* and other official history compilations. Although the *Monthly Archives* had long been considered missing, these archives c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ree early *Veritable Records* compiled in 1636 and Shunzhi reign.

导言

在入关之前的清朝，编纂“史书”时必须的“资料”，大致区分起来，存在着两种资料。一种是以皇帝言行为中心的每日的记录；

另外还有一种是皇帝的上谕、臣下的上奏、还有与诸国的往来文书、以及诸官署的档案等等。到了下一代，前者被整理成“起居注册”，成为编纂实录时的主要资料。不过，在尚未设置起居注官的清初，以皇帝的言行为中心的“每日的记录”，到底是怎样记录下来的

〔收稿日期〕2010-09-12

〔作者简介〕加藤直人（1955—），男，日本国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张永江（1963—），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曹毛响（1986—），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呢?

拙稿就入关前清朝的“日录”以何种方式、由什么人记录的问题,试加以探讨。

—

有关参与清初的“史书”编纂、明和朝鲜以及蒙古诸势力之间的外交文书撰拟的文官群体问题,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关于努尔哈赤时代龚正陆等汉人负责与明和朝鲜等国的官方文书撰写的情况,和田清先生有详尽的研究;^①关于额尔德尼巴克什、库尔禅巴克什、还有达海巴克什等人的事迹,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神田信夫以及松村润等人的翔实研究众所周知。^②尽管如此,之所以草此拙稿,乃是基于这样的现状考虑的,即这些先贤的研究,无论在公文的撰写、史书编纂、古典与法典、正史的翻译等相关的人物方面,抑或是关于他们的业绩、日常情况以及他们的工作如何进行这些方面,迄今仍未得到研究。

《满文原档》^③“晟字档”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十二月的记事^④如下: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i sain doro be;
erdeni baq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 Oerdeni baqsi kicebe gingu n [ji]
ejesu süre be amcaci ojorako; ere bithe be mejige
tabubume arahabi; afari müjilern [i]
fükjin araha bithe be adarame dasara seme, inu
ambula

dasarako; ineku gisun babe da bi;
arahangge inu mangga;

(罗马字转写、翻译由笔者完成,下同。划线部分原文被删除,[]表示附加部分。^⑤)

汗所施一切善政,皆由额尔德尼巴克什(Erdeni Baqsi)记录在册。此即为定本。额尔德尼巴克什勤勉、慎思、博闻强识,天资聪颖远非他人可及。此书稍有增饰。书中皆尽心书写的原始记录,如何能改动?因之几乎未加改动,原文照录。撰写史书,诚非易事。

这是努尔哈赤被推戴为英明汗的前一年末,记述额尔德尼巴克什完成撰写《太祖纪》

一事的有名史料。不过,限于浅见,迄今为止的有关此部分的研究,依然基本上根据后世编纂的《满文老档》的记载进行的,未曾参考作为原本的《满文原档》^⑥。但是,依据这一“晟字档”的记事,当时额尔德尼的著作被视为“定本 an i bithe”,那么可以理解为,无论“荒字档”还是“晟字档”中有关万历四十三年以前的太祖事迹部分,都如实抄录了额尔德尼的著作。

《满文原档》中,在有关由额尔德尼完成“太祖纪”的记载之前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述“晟字档”与“荒字档”文字相同,据“晟字档”内容如下:

gürun de jekui alban jafaci, gürun jobombi
seme; emu nirui juwan haha; duin ihan be siden
de tücibubi, sula bade üsin taribubi, jeku ambula
bahabi kuu gidabi; tere kui jekube ejeme gaijara
salame bure juwan ninggun amban jakon baqsi be
afabuha;

因对国中之民多课以谷物,国民苦不堪言。故每牛录向公家提供十名男丁、四头牛,垦种空地,因丰收而公库充裕。公库谷物记录与出纳,则委之以十六名大臣及八名巴克什。

也就是说,万历四十三年以后,由十六名大臣及八名巴克什专门负责公库出纳的管理与记录事宜。顺便提一下,负责谷物支出的是大臣,“逃人档”里可以看到实际被任命的人名出现:

asan da manju giran; ama altasi genggiyen
han de jeku jafaha amban bihe;

阿三(Asan)原是满洲人。父阿勒塔什(Altasi)为太祖(英明汗)时公库谷物出纳大臣^⑦。

笔者以为,努尔哈赤时代,这类谷物公库的出纳记录是作为首要的。而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关系到汗的言行的场合,是否由巴克什来记录呢。顺便提一下,此场合下的“巴克什”不是称号,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书记”比较好。这样的巴克什的记录与后金同明、朝鲜、蒙古以及其他诸势力之间的往来文书等等,被收集、保管在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或许以此为基础,前述的额尔德尼巴克什的历史

叙述才得以完成。

而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之际，颁布了以下政策：

（天命十一年九月）上与诸贝勒议。立八固山额真。正黄旗那木泰、镶黄旗打喇汉额夫、正红旗和苟兔额夫、镶红旗博尔津虾、镶蓝旗孤三太、正蓝旗拖博和额赤克、镶白旗扯儿格、正白旗康笃里，国家政事，令其肩任料理。与贝子偕坐共议。出猎行师，各领固山而行。凡事皆听稽察。又正黄旗拜尹兔、冷格里，镶黄旗宜松、答主户，正红旗布儿基、叶克舒，镶红旗兀善、绰合诺，镶蓝旗舒赛、康哈赖，正蓝旗佟布路、查必甘，镶白旗吴拜、沙木什喀，正白旗蒙阿兔、阿山等十六人，不令行兵设防，一切国政听其办理，狱讼听其审断。又正黄旗巴布泰阿格、霸奇兰，镶黄旗多内、杨善，正红旗汤古太阿格、查哈拉，镶红旗哈哈纳、叶成，镶蓝旗孟坦、厄蒙格，正蓝旗昂阿喇、色勒，镶白旗兔儿格、宜尔登，正白旗康孤里、阿达亥十六人，设防出征则随行，在国则协理词讼。（《顺治初纂《太宗文皇帝实录》[汉文本]卷一）

由此处记载可知，皇太极基本上是从各旗选拔均等的人员，使之国政以及司法事务。这种各旗均等化的责任与职务分担形式，我想是不是也反映在日常公事记录等工作中呢。

二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着一册被暂称为“逃人档”的档册。该档册主要是记载从天命十一年（1626）十月到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有关从后金逃往外地及从外地投到后金（包括蒙古诸部族的来归等）人员的情况，包含被删除的档案在内，一共收录了171件记录^⑧。

关孝廉先生认为此“逃人档”为“八旗值月档”，做了如下简述^⑨：

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八旗分编为四组，每组为两旗、轮流值班一个月，称作“值月”。在值月期间，两旗将所发生的

事件，逐日记录于册，称为《八旗值月档》。

关先生虽然丝毫没有述及所谓“八旗值月”的制度内容以及始于努尔哈赤时期的相关的依据，本档册却如关先生所言，确定是八旗中相同旗色的两旗轮番当值时的记录簿（按关氏所说为“八旗值月档”）。理由就是收入该档册的大部分档案，在各月的记事正文的开头部分的上部，标记有当值的旗名。例如，第六号档案（编号是笔者为方便起见，按照日期顺序附上的）中，在正文开始部分的上部，记有“jüwe lamun i biya（两蓝旗[当值]月）（天命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卷九十九、第一八丁里）”，且用墨笔圈上。

以本档册所记的附注来看，天命十一年十月到天聪二年十二月之间各旗当值顺序如下。

天命十一年	十月 (没有当值旗记载)	天聪二年	正月 (两红)
	十一月(两蓝)		二月(两黄)
	十二月(没有记录)		三月(两蓝)
天聪元年	正月(两红)		四月(两白)
	二月(两黄)		五月(两红)
	三月(两蓝)		六月(两黄)
	四月(两白)		七月(两蓝)
	五月(没有记录)		八月(两白)
	六月(两黄)		九月(没有记录)
	七月(两蓝)		十月(两黄)
	八月(两白)		十一月(两蓝)
	九月(两红)		十二月(两白)
	十月(两黄)		
	十一月(两蓝)		
	十二月(两白)		

也就是说，至迟到皇太极即位之初，八旗每月轮番（依两黄、两蓝、两白、两红的顺序）当值、记录日常事务的制度无疑已经存在^⑩。

另外，在一般的有关“逃人”的记录之外，如先前所述一样，由蒙古“来归”后金的相关记述也较为常见。其中天聪元年六月至七月间，蒙古敖汉 Aohan、奈曼 Naiman 两部来归后金的一系列相关记录颇有深意。太宗皇太极直接出迎至沈阳郊外的都尔鼻阿拉 Durbi Ala，天聪元年七月初六日，太宗于此地，在

敖汉、奈曼等诸王面前誓天。“逃人档”中收录了蒙文的誓言文书^①，因此皇太极用蒙语来念诵誓文的可能性也可以充分考虑。而且据此还可知是由具有蒙语书写能力之人记录下来的。而《满文原档》的“天字档”^②所收誓文则是用满文记录的。应该是《满文原档》编纂时利用了“逃人档”的这部分，并且引用时将誓文用满文译写并记录下来的。

也就是说，现在所能见的《满文原档》的这部分，是按照某种编辑意图编纂而成的日记体史书，这正如众多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系由以库尔禅为首的任职“书房”的文官“撰拟”而成的。

将“逃人档”与《满文原档》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满文原档》是忠实于“逃人档”的修订校记的。由此看来，“逃人档”应是《满文原档》的原始资料之一^③。而且，我认为由《满文原档》的这部分来看，所用虽然是新满文，而无圈点的部分却很多，另外由它的拼写方法等来看，则处于老满文向新满文的转换过渡期，也就是说至迟应是天聪朝后期抄写的。

三

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两旗轮番当值时的“记录簿”，实际上在《满文原档》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阳字档”、“地字档”和“成字档”的一部分，还有“满附二”（天聪六年档）都标有天聪三年到六年的日期。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藏有题为“内国史院天聪五年档”的档册，几乎遍及全篇都可以看到当值的附注。以下对各档册进行考察。

首先是“阳字档”^④，“阳字档”由四件记事组成。

①天聪三年正月十二日，由蒙古 Urut 国叛离而来的 Minggan Beile 之子 Angkun Darhan Hosooici 因病亡故的相关记事。

②同年二月初五日，与 Angkun Darhan Hosooici 葬礼有关的记事。

③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记李永芳之妻公主去世。

④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有关公主（Fusi

Gege）葬礼的记事。

其中，②的开头部分题“jüwe suwayan i biya 两黄旗当值月”，③在开头部分题“jüwe lamun ninggun biya 两红旗当值闰月”，还有④题“jüwe lamun ninggun biya 两蓝旗当值六月”。由此看来，“阳字档”基本上记录的是与葬礼相关的内容，而《满文老档》中有关该部分的记述也大致相同。可是，唯有④的记事不是六月，不知何故作为闰四月二十三日的记事记录下来，与③的记事发生了矛盾。

其次，看“成字档”^⑤的后半部分与“地字档”。首先，“成字档”的后半部分所记为天聪四年七月至天聪五年二月之事，很明显与前半部分相异，用不同的笔记录，特别是开头部分甚至以天聪四年的干支（šanggiyan morin 庚午）来记录。因而，原来档册中的后半部分很有可能是别的册子。从记事来看，基本上是太宗日常言行、皮岛关系各事等等内容，丰富多样，与“阳字档”相似，没有经过特别的专题设计而记录下来。顺便提及，当值的旗色据记载是“nadan biya jüwe sanggiyan（天聪四年）七月两白旗”、“jakon biya jüwe fulgiyan 八月两红旗”、“jüwe suwayan i biya 两黄旗当值月”（之后以本文 uyun biyai ice jüwe de；九月初二日）接续“jüwe lamun i juwan biya 两蓝旗当值的十月”、“jorgon biya jüwe fulgiyan 十二月十二月两红旗”、“jüwe suwayan i biya 两黄旗当值月”（之后以本文 süre han i sunjaci aniya；aniya biyai ice duin de 天聪五年正月初四日）、以及“jüwe lamun i jüwe biya 两蓝旗当值二月”。也就是说，“逃人档”以后也以黄、蓝、白、红的顺序当值，记录日常公务。

接下来是“地字档”^⑥，这是记录天聪六年的档册。除去最后的部分外几乎都可以看到当值旗的注记。记事内容没有经过特别的专题设计，也有篇幅宏大的日常记述。顺便提一下，当值的旗色，（天聪六年）正月是两蓝，二月是两白，三月是两红，四月是两黄，五月是两蓝，六月是两白，依次至十二月是两黄旗。

本档册的旗名附注中引人留意的一点是六月份的附注，即“jüwe sanggiyan i ejehe ???? ninggun biya 两白旗六月记”，清楚地记述了

“记录”的事实。也就是说，这样在“日记”开头部分的旗名附注不单是表示当值的两旗的旗名，似乎也可以证明当值两旗负有实际记录日常事务的责任。

下面是“满附二”天聪六年档^⑦。此档册的封面记述，“sure han i ningguci sahaliyan bonio aniya; aniya biya ejehe dangse; dahaha monggo beise i hengkileme jihe; gaiha, buhe, fudehe; sarilaha bithe; 天聪六年壬申年，正月档，归顺的蒙古诸王前来谢恩叩头，记恭迎奉送，设宴款待事”。因为正处于老满文向新满文转变的过渡期，可以看到因文官记述不同，部分带有圈点。依据基本的标题来看，因为记述与蒙古王公相关，也可以看到其中多有以蒙语完成的记事。

“满附二”所记的当值顺序当然与“地字档”相同，此处不再重复，本档册三月份也记有“juwe fulgiyan ejehe ilan biya 两红旗三月记”，记述了由当值旗“记录”的事实。

“满附二”的后半部分因为是另外的档册（天聪六年档），与前者连缀在一起，没有记下当值的旗色。

最后来看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国史院“天聪五年档”^⑧。本档册确是八旗轮番当值时所记日常公务事。也就是说，这可能就是本来的八旗当值记录（关孝廉所谓的“值月档”）。本档册以无圈点的老满文记录，极可能是天聪五年左右的档册。可以想见“逃人档”和“阳字档”等专题档册由这样的记录总结整理而成。顺便提及，所记旗色，正月两黄，二月两蓝，三月两白，五月两黄，六月两蓝…的顺序^⑨。

如果把“天聪五年档”同顺治初所纂《太宗文皇帝实录》相比较，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这是从这个档册的史料价值着眼的^⑩，本来“天聪五年档”这样的八旗当值记录，各年代可能都是齐备的。

由以上情况来判断，至少到天聪六年，旗色相同的八旗当值者，事实上已经开始记录以汗的起居为中心的日常工作，这些记录，恐怕如后所述，被收藏到“bithe i boo 书房”（文馆）管理，由那里的巴克什与秀才们以这些记录、及与明、朝鲜、蒙古诸部族的往来文

书、还有官署（组织）的文书等等为材料，编纂专题档册和史书等典籍吧。

四

根据神田信夫先生的研究，负责文书记录的“bithe i boo 书房（文馆）”在天聪三年以前就已经成立^⑪，如此说来，旗色相同的当值二旗与书房（文馆）是并行负责日常的文书记录。有关太宗初期的文书系统由于史料的制约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下面就书房与八旗当值记录的关系问题试作考察。

《太宗实录》（顺治初纂汉文本），天聪三年（1629）四月一日条有如下记录：

上命分文人为两班职掌。命大海榜式翻译明朝古书，笔帖式刚林、苏开、孤儿马弘、托布戚四人副之；库里缠榜式记本朝往来文移及得失事迹，笔帖式吴把什、加素哈、胡丘、詹巴四人副之。满洲文字太祖由心肇造，著为轨范。上即位，聪明盛德，复乐闻古典，故分清汉文人为两班，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因以考己之得失焉。

此段所述事件后来称作“文馆成立”，史料已经被众多先辈学者所使用。由文中所见，记述了巴克什大海（达海）、笔帖式刚林、苏开、孤儿马弘、还有托布戚四人一起负责汉文书籍翻译，而巴克什库里缠、笔帖式吴把什、加素哈、胡丘和詹巴四人一起负责记录本朝往来的文书以及得失事迹，明确职务分工，并行协作。

如神田信夫先生既有的研究所言，此段事实虽不能明确意味着文馆的设置，但是达海等人负责汉文书籍翻译、还有库里缠等人担当记录往来文书以及史事，责任分工，摄职从事。因而可以知道天聪三年时，他们所属“书房 bithe i boo”的巴克什和笔帖式们并非轮番当值负责日常文书记录。

接下来所见是《奏疏稿》（《天聪朝臣工奏议》“史料丛刊初编”所收）所收的（天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杨方兴条陈时政奏”，胪列了当时书房的几点问题。

书房秀才杨方兴谨陈时政数款，开列

于后：

一、书房中当用贝勒。书房实六部之咽喉也，一切往来国书暨官生奏章，俱在于斯。若无总理之人，未免互相推诿。臣遍观金汉中人当此大任，亦不敢当此大任，皆恐日久生嫌。臣想六部皆有贝勒，而书房独无，乞皇上择一老成通达政事的贝勒，在书房中总理，不必每日劳动他，恐衰贝勒之尊，或三五日来一次，内则查点书房本稿，外则代伸六部事务。凡大小奏章、先与贝勒说过，该进上者进上该发部者发部，庶书房官生，有头领，好用心做事，再各分执掌，总听贝勒约束，方成个大规矩。伏乞圣裁。

一、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式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式，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

由以上杨方兴的奏议可知，天聪六年十一月时，书房负责管理往来国书与奏章，而没有设置总理书房事务的贝勒。

三田村泰助先生认为，上边的奏文中巴克什所任书房的满文日记，若前后加以推敲，必定是额尔德尼、库里缠所作。换句话说可能就是《满文老档》^②。

但是，此处所言的“日记”并未记录为“巴克什所作”，也可能是旗人轮番所记“日录”，以及以此为基础作成的日记体“史书”的总称。这一时期，这类日常记录由书房管理，他们的职务如前所述，负责管理这类资料以及史书的编纂，还有文中所提到的满汉文翻译。

如三田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杨方兴的奏影响了太宗，第二年十月太宗命令书房（文馆）的儒臣编成“太祖行政用兵之道”的史籍传与子孙^③。并指责书房官员的能力等相关问题^④，天聪八年四月举行考试，首次选拔刚林为首的举人十六人^⑤。另外，以六部的设置为代表，开始由“八旗轮番记录”的阶段迅速地转变到遵从中国历代制度进行记录的新阶段^⑥。

结论

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二旗按月轮番记录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就被延续下来了。其记载内容从“天聪五年档”来看，包括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这些作为“日录”由书房保管，并以此为基础编辑成专题档册；在书房中与对外文书一起，作为史书编纂时的基础资料而被使用。如开头所提到的问题一样，额尔德尼巴克什所著“太祖纪”，也是以书记巴克什们的记录（信息）为基础加以拼合衔接、综合而成的。

八旗轮番的旗人们的“日录”现在已经难看到了，以这些记录“拼合”而成的史书，也就是不久后崇德元年（1636）的《太祖太后实录》，还有顺治年间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与其有着密切关联。

①和田清《龚正陆传补遗》，《东洋学报》第四十卷第一号。

②三位先生都有详细的研究论文发表，作为代表性的成果可以举出，三田村泰助《满文史料解说》（《清朝前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神田信夫《清初的文馆》（《东洋史研究》第一九卷第三号，之后《清代史论考》所收）；还有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东北亚文献研究会，2001年）。

③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原档》，1969年第

一次以《旧满洲档》为题影印出版，因为印刷的对比度过强，使得原文删除部分及添加部分的判读相当困难。最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以《满文原档》为题，采用先进的摄影和印刷技术，重新影印出版（2005年，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刊）。本稿很大部分利用了新版的《满文原档》，引用时《旧满洲档》略称《旧》、新版的《满文原档》略称《新》。

④《满文原档》中有关该时期现存两份文本，即《荒字档》与《畏字档》，实际上《荒字档》并不包含后

半部分“Erdeni Baqsi……”以后的记事，而仅存于《晟字档》。很可能这部分是“晟字档”编辑时，天聪年间又加上的内容。另外，“an i bithe ere inu：此为定本”字样的有关部分在《满文老档》中依《晟字档》所记加以删除。顺便提及，《荒字档》（第62页）有该部分存在，却没有被删除。

⑤有关其他的转写，遵从以下规则：

（a）固有名词的转写，以《满文老档》等确认的相关记写形式为准。

（b）waw + yodh 中所示元音用 ü 转写。

（c）关于在 Möllendorff 转写方式中闭音节末尾同样用 k 来转写的辅音，与蒙语中 γ 对应的写作 q、g，这里用 k 转写。

（d）与新满文拼写法显着不同的语词，依原样转写。

⑥旧：第一册，第312页；新：第一册，第125页。

⑦《逃人档》天聪三年八月初三日，第一三四号档案（加藤直人《逃人档》〔东北亚文献研究会2005年〕第62页）。

⑧加藤直人：《解说》（拙著《逃人档》）。

⑨关孝廉《盛京满文逃人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四辑，第1页。

⑩此制度创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从《满文老档》来看，可以断定以天命六年为界，记事形态发生了变化。那时的文书记录已经强化了年代色彩，天命六年以后，比方说从逃人的记录来看的话，开始编成由“日录”而来的摘录的形式。以何种形式、怎样记录暂且不说，可以认为，天命六年，制度性的“逐日记录”已经形成了。

⑪《逃人档》第三四号档案（拙著《逃人档》第20-21页）。

⑫旧：第六册，第2691-2693页；新：第六册，第130-132页。

⑬《满文原档》编辑之时，为何不采用八旗当值记录，而使用摘录而成的《逃人档》呢。也许《满文原

档》编纂时，八旗当值记录中天聪元年至二年部分已亡佚，详细情况不明。

⑭旧：第六册，第2865-2868页；新：第六册，第299-303页。

⑮旧：第八册，第3621-3647页；新：第八册，第23-48页。

⑯旧：第八册，第3649-3904页；新：第八册，第49-293页。

⑰旧：第八册，第3905-4066页；新：第八册，第295-445页。

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国史院档”卷号〇〇四、目录号一〇七、册号一。另外，有关本档册的复制，得到楠木贤道先生相助，在此感谢。

⑲过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国史院档”卷号〇〇一、册号二（《太祖纪》）的卷尾窜入的史事已经判明为《天聪五年档》的一部分，现在被重新补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天聪五年档》的开头部分。之所以能够搞清楚这一点，还是因为此部分的上部记载了八旗当值的记录。

⑳以《天聪五年档》作为史料的研究，可以举出楠木贤道《从天聪五年大凌河攻城战看爱新国政权构造》（《东洋史研究》第五九卷第三号，2000年）；以及《清太宗皇太极朝对蒙古诸王的册封》（《中华世界的历史性展开》，汲古书院，2002年）。

㉑神田信夫，《清初的文馆》，第44-45页。

㉒三田村泰助，《满文史料解说》，第333-334页。

㉓上引三田村泰助文，第331-332页。

㉔上引神田信夫论文，第50页。

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国史院档 天聪八年”、天聪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78页）。

㉖有关八旗轮番“日录”究竟起于何时，至今为止只能确认到天聪六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虽保存有“值月档”残页（登录号：一六七六〇二），具体情形并不明确。